

■综述

## 呈现民间文学百花争妍的图景

——回望云南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 □刘建波(彝族)



彩云之南是多民族世代生活的福地,也是民间文学活态发展的沃土。中国民间文学和民俗学学科奠基人钟敬文先生曾说:“民间文艺,是民众直接创造的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同时它还是各民族伟大作家创造的有力的影响者。”云南民族民间文学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传承载体,在民族文化强省建设的道路上愈发显现蓬勃生机。站在新时代,回顾云南各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的过往,既是继承历史、观照当下和面向未来的学术之旅,也是发挥人文学科助力社会发展的担当之举。

云南民族民间文学源远流长,对它的搜集整理工作,很早就开始了。但毫无疑问,1949年“边纵”队员杨放对彝族撒尼人叙事长诗《阿诗玛》的搜集,是一个标志性的节点。从那时起,云南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已走过70年春秋。一路走来,历次云南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都在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的直接领导下,文联、文化局、高校等多部门团结协作,工作队员克服难以想象的重重困难,深入农村,与人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走村串户,拜访民间歌手和祭司,从一个民族到多个民族,从神话故事到史诗歌谣等多题材先后被发掘、整理和出版,呈现云南民族民间文学百花盛开的景象。这一史无前例的搜集整理工作,激发了各族人民寻找民族“根谱”的热情,在百花园中寻找本民族的“阿诗玛”,各民族群众的文化心理由之前的自卑变为自信。搜集整理工作既锻炼了一批热爱民间文学事业的大学生,更培养了本土的民间文艺人才,以康朗英、康朗用等为代表的歌手为传承发展民族民间文学起到重要作用。

## 一、全面搜集整理的黄金期:发现和发掘云南民族民间文学资源宝藏

20世纪50年代,云南省开展了3次有规模的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打开了云南民族民间文学资源大宝藏。这一时期,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组织中国作协昆明分会、云南省文化局、云南大学、昆明师范学院、云南省文工团等组成若干民族民间文学调查队,深入全省各地发掘民族民间文学。例如,1953年,以云南省文工团为主力的圭山工作组赴路南(今石林县)彝族撒尼人地区搜集整理叙事长诗《阿诗玛》,美丽、善良的“阿诗玛”形象从此深入人心。《阿诗玛》的成功搜集整理,让人们看到了“人民性”本质特征的云南民族民间文学走进了人们的视野,走向了世界,也极大推动了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1956年,又组织3个调查组赴红河、大理、思茅、丽江等地区,并初步形成哈尼、白、彝、傣、纳西等民族的民间文学情况报告,为后来撰写各民族文学史打下坚实基础。1958年,“新民歌运动”拉开序幕。云南省组织云南大学和昆明师范学院1955级学生、部分文艺干部和基层文化工作者组成100余人的7个调查队,分赴楚雄、大理、丽江、德宏、西双版纳、红河、文山等地,按照“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的十六字方针,对各民族民间文学做全面调查。彝族创世史诗《梅葛》《查姆》《阿细的先基》、纳西族史诗《创世记》、傣族叙事长诗《娥并与桑洛》、白

族故事《火烧松明楼》等一大批民间文学作品被发掘整理,成为中国民间文学史上的经典。此后,云南省又曾几次组织调查组对拉祜、傣、独龙等民族的民间文学作品进行调查,更加深入、全面、系统了解各民族民间文学情况。

在全面搜集整理期间,云南民族民间文学的巨大宝藏从首次发现到资源发掘,从一个民族的文学搜集整理到多民族全面翻译整理,从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到民间文学与宗教关系话题讨论,都引起了巨大反响,呈现了云南民族民间文学百花争妍的图景。

## 二、选编作品的新时期:普查性搜集和编纂云南民间文学“三套集成”

云南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的有力推进,得益于多方面力量的有力支援。在“前二十七年”,云南省委宣传部部长、诗人袁勃,云南省文联主席、学者徐嘉瑞等亲自参与搜集整理,《逃到甜蜜的地方》《望夫云》等脍炙人口的作品就是例证。云南省文联(筹委会)兄弟民族文艺工作委员会、中国作协昆明分会民间文学工作组对云南民族民间文学遗产的搜集整理工作进行了指导和规划。进入新时期之后,随着1981年云南省民间文艺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云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正式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云南分所、云南省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和云南省民间文学集成编辑办公室等专业的业务机构先后成立,为新时期云南民族民间文学的普查搜集和作品选编作出了积极贡献。

从1984年开始,一场自上而下的云南民族民间文学集成编纂工作全面推行。云南省按照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关于“科学性、全面性、代表性”的集成资料编辑体例要求,广泛发动各地力量,全省各州、市、各县、区都成立了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专门负责民间文学集成选编工作。历时20年,共普查搜集到1亿多字、300多部资料集,成为编辑集成的重要基础。云南省成功编纂《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云南卷》(上下)、《中国民间歌谣集成·云南卷》(上下)、《中国民间谚语集成·云南卷》,共计600多万字,于2004年正式出版发行。“三套集成”(云南卷)成为具有历史文献性、学术资料性和文学代表性的民间文学丛书,被誉为云南文化“长城”。

## 三、民族古籍翻译的新世纪:书面与口头民间文学共同发展

云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不仅以口头形式传播,还通过民族古籍文献记载方式流传至今。在云南的世居少数民族中,彝、纳西、傣等大部分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千百年来,这些民族不仅用口传心授、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承口头民间文学,还用民族文字将之记录在册。因民间文学与民间信仰、祭祀仪式等信息相关,民间的知识分子兼宗教祭司,诸如毕摩、东巴和赞哈等成为本民族最权威的民间文学传承者。改革开放初期,在“救人、救书、救学科”精神指引下,

一批民族翻译人才经过专业学习和培训后,深入乡村,向毕摩、东巴、赞哈等收集、翻译和整理大量的民族文献古籍和口传古籍,成为云南民族民间文学的重要来源。云南省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楚雄彝族文化研究院、丽江东巴文化研究院、红河民族研究所等研究机构一直致力于开展少数民族古籍抢救保护工作。新世纪以来,《彝族毕摩经典译注》(106卷)、《中国贝叶经全集》(100卷)、《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100卷)等先后出版,成为涵盖民族神话、创世史诗、英雄史诗、民间故事等民间文学多种类别在内的精品力作。《云南少数民族古籍史话》和《云南民族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总目提要》等,都是民族古籍文献中民间文学精粹的汇编,为云南民族民间文学研究提供重要的学术参考资料。

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范围“非遗”保护的呼声日益高涨,2004年中国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随后《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颁布实施,云南民族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和抢救工作走上法制化道路,一大批曾在黄金期搜集整理的民间文学作品被列入国家和省级保护名录。例如,彝族叙事长诗《阿诗玛》、史诗《梅葛》《查姆》,哈尼族的“四节生产调”、哈尼哈巴,纳西族的《黑白战争》,拉祜族的叙事长诗《牡帕密帕》,阿昌族的史诗《遮帕麻与遮米麻》,佤族的史诗《司岗里》等,已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相应地,王玉芳、郭有珍、方贵生等一大批民族歌手、民间文艺人才,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有效保障了民间文学的活态传承和发展。此外,在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中,昆明、大理、丽江等市、州的又一批民间文学经典入选,为“非遗”保护增添新的成果。

## 四、放歌新时代:云南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必将迈上新台阶

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对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了重要部署,“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工程”被列为重点实施项目之一。大系出版工程按照“科学性、广泛性、地域性、代表性”原则选编,以省立卷,按体裁归类民间文学作品及理论研究成果总结,到2025年,预计出版民间文学各类型的大型文库1000卷,共10亿字,并建成“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据库”。云南省以丰富的民间文学资源、多元的民间文学内容和多样的民间文学门类,积极助力大系出版工程。2019年,《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神话·云南卷(一)》《中国民间文学大系·长诗·云南卷(一)》《中国民间文学大系·长诗·云南卷(二)》作为出版工程首批成果,向世人展示了云南民间文学的丰富性,进一步推动了全社会共同参与民间文学的发掘、传播、保护与发展的热潮。

搜集整理民族民间文学,是在筑牢民族团结的文化基石,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放歌新时代,云南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必将从全面发展走向辉煌绚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在经历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新潮文学轮番上演的十余年后,到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陕军东征”的行动,区域作家群创作成为文学界的亮点,出现了文学豫军、文学陕军、文学鲁军、文学湘军、文学晋军等作家群体。在祖国西南角的广西,也冒出了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作家群,它就是以“广西三剑客”东西、鬼子、李冯三人为领军人物的文学桂军。有学者评价说,“文学桂军的崛起,既是改革开放催育的文化硕果,又是文化多样性视野下的区域文化崛起的一个印证。”“他们以现代和后现代的叙述方式呼啸而来,让文坛大吃一惊。”

对于区域作家群的研究,学者杨义曾说:“在我的意念里,中国文学地图的绘制,需要在时间纬度上强化空间纬度的研究,在中心动力上强化‘边缘的活力’的研究。”文学桂军就是这种“边缘的活力”的重要代表,其生成机制、创作现象和内蕴规律,对区域作家群研究来说具有重要的标本意义。2004年,“文学桂军研究”进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许多重要的研究与批评成果不断涌现。青年学者钟世华2015年开始主编《文学桂军研究资料丛书》,其编著的第一本著作《文学桂军研究资料丛书·韦其麟研究》2019年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将文学桂军研究继续向前推进,体现了新的学术创新性。

第一,系统性建构。进入21世纪以来,对文学桂军的研究不断深化,如《广西散文百年》(徐治平主编,2004年)、《广西文学50年》(李建平等著,2005年)、《广西文学艺术十三年现象研究》(蓝怀昌主编,2007年)、《广西文学艺术六十年》(潘琦主编,黄德昌、容本镇执行主编,2010年)等。这些研究做得非常扎实,但都不是对文学桂军的专项研究。即使是2004年对文学桂军作专项系统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经济欠发达地区一个重要作家群的崛起及意义——文学桂军论》,仍未将改革开放以来至90年代初的重要作家囊括入内。《文学桂军研究资料丛书》的目标是建立全面、系统的有关“文学桂军”的资料体系。钟世华以开阔的视野将研究范围进行拓展,编入了《文学桂军论》未纳入的老作家周民震和韦其麟研究,还有朱山坡、田耳等新锐作家的研究。当然,要把资料做全、做专,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先从个案研究开始。这套《文学桂军研究资料丛书》,目前暂定编选周民震、韦其麟、东西、杨克、林白、黄佩华、凡一平、朱山坡、田耳9位作家的研究资料专集和1本收录李建平等、张利群、容本镇、张燕玲、黄伟林5位评论家的研究资料合集。如此选择,有经费的原因,也有对一些人资料工作已做得比较完备的作家的回避,还有对一些资料尚不充沛的作家的舍弃。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是文学事业的两翼。可以说,这套丛书实现了“两翼兼顾”。如此这般,使文学桂军研究的系统性建构继续向前推进。

第二,资料详备。其中不少是新挖掘的材料。《文学桂军研究资料丛书》的《编选说明》中说:“本研究资料共分为7大部分,即作家小传、研究综述、自述、访谈、印象、评论文章选辑、研究论文选、作家作品索引、研究成果索引。特别说明的是,20世纪30年代出生的老作家增加‘文学史有关作家的章节’这一部分内容。”可见编著者有着系统的资料收集理念。编著者深谙研究资料对于学术研究的极端重要性,收集资料用功甚勤。在《韦其麟研究》中,我们看到了多籍韦其麟的回忆录,如《难以磨灭的童年记忆》《记忆山野里最初的花朵》《学生时代的课余爱好》《1957年,告别塔斯山》《难忘岁月》《鹤鸣江瑛记》等,读者可以由此了解到作者早期生活中的种种境况。书中还附有一封韦其麟《致友人的书信》,韦其麟说到,不少资料自己都忘记了,却被编者搜罗整理了出来。另外,《韦其麟研究》对20世纪80年代周作秋编选的《韦其麟作品系年(1953—1983)》进行补充,使资料更加完整。

第三,以研究理念进行资料汇编。以往编作家研究资料集,大体有“冷编”与“暖编”两种。前者是单纯辑录编排资料,甚至都不作分类,避免出现编者的态度甚至观点,通常是在书前写一长序,表述编者的工作目的,表达工作态度,甚至评价意见,以期帮助读者理解编者意图和正确使用资料。《文学桂军研究资料丛书》应该属于“暖编”类型。书中还收入编著者的研究论文,如《韦其麟研究综述》《壮族身份认同中的民族寻根与文化守护——韦其麟诗歌研究之一》等。在《韦其麟研究综述》中,编著者鲜明提出编撰资料性研究专著的设计:“当下对韦其麟的研究应出现诸如创作年谱、作品与研究文章索引以及研究论文选等综合性的研究专著,这样一方面有助于更好地梳理、挖掘与反映韦其麟自身的创作实绩与文学价值,对韦其麟的创作状况有更为清晰全面的了解;另一方面也为学界对韦其麟的后续研究提供资料上的便利,为韦其麟作品的诗学价值与史学意义的进一步呈现做好铺垫。”如此强烈的理念扩张,体现了以资料烘托研究、以研究引导资料的编著模式,促进文学桂军资料研究的学理化。

文学桂军是多民族作家群体,广西文学呈现的是各民族文学繁花竞艳的壮观。一部《文学桂军研究资料丛书》,呈现的是民族地区多民族文学融合之美,也隐藏着民族作家崛起之堂奥。这种研究是对区域多民族文学的多元审视、综合思考。从已经出版的《韦其麟研究》来看,这套丛书建立起了广西作家综合研究的构架,无论是对于“存史”还是助推研究来说,都必有着重要的价值。

## 不断深化对文学桂军的系统性研究

——从《韦其麟研究》看《文学桂军研究资料丛书》的价值 □李建平



## 内蒙古作家阿云嘎追思会举行

本报讯 6月20日,“内蒙古作家阿云嘎先生追思会”在呼和浩特举行。内蒙古文联党组书记冀晓青、副主席包银山,作家哈斯乌拉、刘成、邓九刚、尚贵荣、哈达奇、刚、乌雅泰、萨仁托娅、布仁巴雅尔、阿古拉泰,阿云嘎的女儿塔娜、那日苏等20多人参加追思会。内蒙古作协主席满全主持会议。

座谈会上,大家共同追忆与阿云嘎交往的点点滴滴,怀念他豪爽的性格、坦荡的胸怀、杰出的才华,以及在创作上取得的成就。大家认为,阿云嘎的作品深刻地反映生活现实,同时也以温暖的人性光辉去照亮人们的心灵,给人们光明的生活前景。他自觉地践行着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用生命的旋律谱写了代代相传的文学篇章,无愧于作家的使命。我们召开追思会,深切缅怀阿云嘎先生的同时,要充分发挥以阿云嘎为代表的老一辈作家艺术家的引领示范作用,始终坚持把个人价值追求融入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和民族复兴的历史洪流中。要始终坚持为草原书写、为人民放歌的责任担当,在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中找寻灵感、汲取营养、丰富创作,推出更多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现实题材文艺作品,始终坚持崇德尚艺、德艺双馨的精神风范,自觉追求创作与修身共进,追求人品和艺品俱佳,争做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新时代文学工作者。

“骑手绝尘去,文章传人间”,阿云嘎从事文学创作40余年,出版有长篇小说《满巴扎仓》《僧俗人间》《有声的戈壁》《留在大地上的足迹》《燃烧的水》《拓跋力微》、中短篇小说《大漠歌》《幸运的五只岩羊》《浴羊》《路上》等。这些作品为大漠草原而书写,从个人的生存经验出发,表达对本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转型、生态环保、人民精神风貌变化等方面的思考。在其作品中,个人经验故事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进入现代化的进程联系在一起,深刻反映古老草原在新时期的巨大变迁。

塔娜、那日苏代表家属向与会的作家评论家表达了谢意。她们说,父亲一辈子都在写文章,其实在教给我们做人的道理。父亲为人谦和,待人接物从来都是和善而且宽容。父亲总跟我们讲,他作为一个牧人的孩子,能有今天已经很知足了,他知足常乐的性格深深地影响了一家人。我们会继承父亲乐观向上的精神,做好人,做好事。(蒙 讯)

■声音

## 小说的两种境界

□马笑泉(回族)

任何一种文体能够成立,均有其他文体不可替代之处。小说的“近邻”是戏剧和散文,但戏剧和散文不能替代小说,反之亦然。欲成就这一文体,首先须在不可替代之处用功,以求“是其所是”。

就小说而言,写作者切勿被“写得像打情诗一样”“这是一篇散文化的小说”等说法所迷惑。此等说法主观上或许是在赞美,客观上实乃指证小说创作之失败。小说家首要工夫在于将细节尽力推开,细节与细节之间进行精密衔接,这与诗之浓缩和跳跃背道而驰。诸多细节精密衔接之后,还须呈现为一个立体化的整体,此为小说的结构艺术,与散文的平面结构(即章法)有质的区别。戏剧亦求立体结构,但为物理空间和时间所限,须删繁就简,高度压缩。古典主义的“三一律”虽为后世浪漫派和现代派戏剧家所诟病,然其能确立并统治西方戏剧界多年,皆因其着眼于戏剧之所以成为戏剧之处,即从某个角度确立了“是其所是”——虽然它是一种狭隘化的理解和规定。小说不若戏剧为物理空间和时间所限,结构既可保持主干之鲜明,又可最大限度地包容枝叶之繁衍,此不一定为小说结构优于戏剧结构之处,但定为小说区别于戏剧之处。细节、结构之外,人物之塑造、氛围之营造、语言之讲究,小说皆有与其他文体泾渭分明之处。写作者宜先于这些泾渭分明之处用功,虚心体察,孜孜以求,把小说写得“是其所是”,方有望成为合格的小说家,也即达到专业水准。小说家不必以小说创作为职业,但必须达到专业水准,否则即便以小说创作为职业,终究只是业余作者而已。小说家“是其所是”,只能从小说“是其所是”中求得。

能够完全、准确地“是其所是”之后,小说方无愧于小说之名,小说家方无愧于小说家之名,正所谓名与实符、表里浑然,足以泰然自立、悠然自得。然在艺术上有大抱负者,还须往“是其所不是”上用功。小说“是其所不是”,入手之处,在于竭力将他种文体之长化入小说之体。此非“写得像打情诗一样”或“散文化的小说”,而是将他种文体如诗歌、散文、戏剧、文学评论、报告文学之有利因素化入小说——“写得像打情诗一样”或“散文化的小说”则系自家根基尚未铸牢而被他者所化。能将他种文体化入小说而不失却自家根本者,亦能将他种艺术门类如电影、音乐、舞蹈、绘画、书法之有利因素化入小说,还可从哲学、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化学、物理学、天文学、地理学乃至种种日常手艺、游戏中采撷有利因素化入小说,以此拓展小说的边界,充分释放小说的诸多可能性。《务虚笔记》将哲学思辨化入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将音乐化入小说,《命运交叉的城堡》将塔罗牌玩法化入小说,此皆为成就小说之大而不失其为小说者也。不失其为小说者,“是其所是”之功;成就小说之大者,“是其所不是”之功。先求小说之“是其所是”,后为小说之“是其所不是”。如何能“是其所不是”?须由小说所不是处求其是,方可“是其所不是”。此番工夫不可颠倒来做,须步步夯实,层层递进,否则容易堕入所谓跨文体写作的歧途,自欺欺人,糊涂了事。

这两种境界,修炼时有先后之别,成就后却难分彼此:“是”中有“不是”,“不是”中有“是”,两种境界实为一种。这两种境界,亦不为小说所独有,而为一切艺术门类所有;亦不为文学所独有,而为一切艺术所共有。